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仲伦 译

君子及其崇拜者

——摘自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录

其崇拜者

摘自一个无名氏的回忆录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著 臧仲伦译

Ф · М ·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СЕЛО СТЕПАНЧИКОВО И ЕГО ОБИТАТЕЛИ

根据苏联莫斯科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5年单行本译

伪君子及其崇拜者

〔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
臧 仲 伦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云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10,000
1982年2月第一版 1982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5,800

统一书号: 10116.864 定价: 0.86元

译者序

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高尔基指出：“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两个最伟大的天才；他们以自己的天才的力量震撼了全世界，使整个欧洲惊愕地注视着俄罗斯，他们两人都足以与莎士比亚、但丁、塞万提斯、卢梭和歌德这些伟大人物并列。”^①

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和创作又十分复杂，充满着矛盾。正如列宁论托尔斯泰时指出：

“俄罗斯母亲呵，
你又贫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②

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小说，也即她的成名作《穷人》。1849年春，他因参加当时的革命团体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和当众宣读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被

① 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0页。

②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第2卷，第370页。

捕入狱。同年十一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二十一人被判死刑。十二月，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可是在临刑前的最后一刻，送来了沙皇的赦免书。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改判四年苦役和六年军役。

大家知道，经过十年的监禁、苦役和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放弃了他青年时代的空想社会主义信念，不再相信沙皇制度有推翻的可能，主张忍辱含垢，逆来顺受，在宗教中寻求心灵上的解脱。

是敌人的死刑判决和苦役营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了吗？是他苟且偷生、贪生怕死吗？不！他在监狱里和在法庭上不愧是一个革命者。被判死刑、绑赴刑场、临刑前的赦免、苦役、流放，都没有能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屈服，使他改变自己的信念。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忆道：“我们这些彼得拉舍夫斯基分子，站在断头台上，听着对我们的判决，毫无悔改之意。”“摧毁我们的不是流放的岁月，也不是痛苦。恰恰相反，任何东西都没有能摧毁我们，而且我们的信念，由于意识到业已完成的天职，从精神上支持了我们。”“不，是一种别的东西改变了我们的观点、我们的信念和我们的心……这另一种东西，就是与人民的直接接触，在共同的不幸中与他们的兄弟般的结合……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是立即发生的，而是逐渐地，在过了很久很久时间以后。”①

在革命失败和小资产阶级革命幻想破灭之后，在参加过革命的人们中，有些人总结历史的教训，修正自己的错误，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1926—1930年版，第11卷，第138页。

前仆后继，变得更坚定了；有些人则彷徨、动摇、颓唐、陷入深深的苦闷中；有些人则顺风转向，变成了可耻的叛徒。

应当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革命高涨的时候，在政治上是不坚定的，思想上也有矛盾和怀疑。由于革命运动失败和身陷囹圄，他在痛定思痛之余，对自己的过去作了全面的回顾与思考，陷入深深的苦闷中。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放弃了从前的信念呢？第一，孤独，可怕的孤独：没有同志，没有朋友，没有报刊，没有书籍，与外界完全隔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性格本来就比较内向和忧郁，物质上和肉体上的痛苦更加深了他的忧郁症。在孤独、彷徨与苦闷中，他开始思考过去的一切，出现了无法克服的思想危机。

第二，在被捕以前，他蛰居彼得堡，接触的人除了城市贫民以外，就是知识分子，没有见过真正的人民，特别是农民。在苦役营，他第一次置身于一批刑事犯中。这些人多半是农奴，少部分是士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人片面地看成俄国人民的代表。他看到了他们的优点：智慧、才能和光辉的人性的一面，同时也接受了他们的信仰和偏见。“人民”的落后、保守和逆来顺受，使他不由得认为，他过去的理想与人民“格格不入”，也许“未必正确”。

第三，在苦役营中，他切身感受到了在农奴与地主、贵族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降到社会的最低层，即使同是天涯沦落人，他们也绝不原谅他，把他看作自己人。苦役犯对他的敌视和不信任，加深了他的痛苦。他不知道怎样才能跨越他与人民之间的鸿沟。为了与“人民”打成一片，他拜倒在他们的愚昧和落后面前。

他开始认为他从前的“社会主义”理想是“没有基础的”，人民不拥护。他不再相信通过革命可以改变现实。他主张象基督一样“忍受和宽恕”一切，以求得心灵的再生和道德的更新。

但是，他的世界观的变化不是立即发生的。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时期。《斯捷潘奇科沃村及其居民们》（以下简称《斯捷潘奇科沃村》即《伪君子及其崇拜者》）就是在这个过渡时期写成和发表的。它在思想上带有明显的过渡性。

二

经过十年的苦役和流放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9年底回到彼得堡。回彼得堡之前，他在流放地写了两部小说，一部是《舅舅的梦》，一部是《斯捷潘奇科沃村》。

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认为《舅舅的梦》写得不好，很粗糙，是为了钱不得已而“编出来”的。可是这部作品却出乎作家意料之外，受到了批评家的好评。认为他继承和发展了果戈理的传统，是一部现实主义的讽刺小说。

《斯捷潘奇科沃村》作于1858—185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于这部作品曾寄予很大的希望。他认为，这本小说他是“认认真真”写的；放进了他的“灵魂”，他的“血和肉”；并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甚至超过了 he 过去所写的一切，包括他的成名作《穷人》在内。他指望，在他被迫离开文坛十年之后，这部作品有助于“巩固”他的文学名声。

谁知道，事与愿违，这本小说“失败”了，它遭到各方

面的冷淡。

《斯捷潘奇科沃村》发表前后的遭遇，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惊讶，也很伤心。他在一封信中写道：“……里面有两个巨大的典型性格，这是我花了五年时间创造和记录下来的，塑造得无懈可击（按照我的意见），——这两个性格完全是俄国的，但时至今日俄国文学还没有很好地指出过”。^①他又写道：“我相信，在我的小说里有许多令人厌恶的和单薄的东西。但是我坚信（哪怕砍了我的脑袋），其中也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它们是从我的心里浇铸出来的。有许多高度戏剧性的场面，许多果戈理见了也一定会举手赞成的场面。”^②

为什么作者和读者（包括批评界）的意见如此大相径庭呢？这部作品失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作者认为这是他最好的一部作品，非但“无可比拟地高于”《舅舅的梦》，甚至还超过他蜚声文坛的成名作《穷人》呢？为什么他认为他创造了两个几乎“无懈可击”的俄罗斯性格，甚至果戈理见了也会举手赞成呢？

三

《斯捷潘奇科沃村》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多年孕育的心血结晶，是他对生活观察和思考的精粹。这是一部深刻的哲理性作品。在表面的谐谑和皆大欢喜中蕴蓄着难言的隐痛。发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1卷，第246页。

② 同上，第251页。

人深思，也令人猛省。

这样一部作品怎会受到广大读者的冷落呢？

主要因为它脱离现实，脱离政治，脱离当时的阶级斗争。

这部小说发表于1859年。当时正处在俄国“农民改革”（1861年）的前夜。可是就在这时候，脱离政治斗争十年、对当时的社会思潮几乎一无所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了这部不合时宜的书。这是一部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虽然作者描写的并不是当时激动人心的农民问题，但是他却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反对农民运动，美化农奴制，把改革前的俄国农村涂上了一层田园诗般的太平景色。地主与农民安居乐业。农民还口口声声对自己的老爷说：“你们是父亲，俺们是你们的 孩子！”地主与农民的关系成了相亲相爱的父子关系？！家奴加弗利拉为了在福马面前维护自己的人的尊严，居然说出了这样的话：“不，福马·福米奇，我的话不是放肆。我是一个奴才，也不应当在你这个天生的老爷面前放肆。……我已经活了六十二岁。我父亲还记得那个恶棍普加乔夫，我的爷爷是和老爷马特维·尼基吉奇……一起，在一棵白杨树上被普加乔夫吊死的。为此，先父受到已故老爷阿法那西·马特维依奇与众不同的尊敬：他做过老爷的随从，并以管家而终天年。”大家知道，普加乔夫是俄国十八世纪农民运动的领袖。身为农奴的加弗利拉居然以他的爷爷与老爷一起被普加乔夫吊死在同一棵白杨树上而自豪，——这不是奇谈怪论又是什么呢？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①

① 《鲁迅全集》，第4卷，第453页。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十年代因宣读具有反农奴制思想的别林斯基给果戈理的信而被捕入狱，而在出狱后居然把这样一些话放进无疑是小说正面人物的加弗利拉之口，这怎能不引起人们的失望呢？

我们不应该怀疑，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反对农奴制的。后来，他虽然走上了歧路，但他终其身都是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一边的。但是，他为什么又会写出这样的作品，说出这样的话来呢？

第一，在经过十年的牢狱生活之后，他急于重新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但又十分害怕书刊检查。他说：“我还在西伯利亚的时候就把它写好了，这是出狱后第一次写东西，唯一的目的是为了重新开始自己的文学生涯，我当时非常害怕书刊检查（对过去的流放犯），因此不得已写了这个鸽子般驯良和十分无害的小东西。”^①这段话讲的是《舅舅的梦》，但在某些方面也同样适用于他出狱后的第二部作品《斯捷潘奇科沃村》。

第二，他多年囚居西伯利亚，离群索居，脱离当时的政治生活，脱离当时的社会思潮，在社会运动急速高涨的年代出版远离社会激情的书，不管它谈的问题多么重要、多么深刻，都注定要失败。

第三，经过十年流放之后，在他的世界观中逐渐产生了一些消极的东西：他认为俄国人民的特点就是忍辱含垢，逆来顺受；纵然一时起来反抗，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第3卷，第85页。

四

《斯捷潘奇科沃村》的可贵处，就在于作者着意刻画了两个“巨大的典型性格”——福马·奥皮士金和叶戈尔·罗斯塔涅夫，即伪君子和他的崇拜者。

福马·奥皮士金是一个伪君子，是俄国的达尔杜弗。

他本是一个穷愁潦倒、浪迹江湖的失意文人。后来为了谋生，投到将军门下，当了一名侍读。就其身份而言，充其量不过是一名寄人篱下的食客，即鲁迅先生称之为“帮闲”或“二花脸”那一类人物。将军死后，他用吹牛和伪善骗得了他的新主人罗斯塔涅夫的信任，一跃而为这家的精神导师，成了斯捷潘奇科沃村大权独揽的暴君。他喜欢在精神上折磨人，以证明他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因而上至主人罗斯塔涅夫，下至小厮法拉列依无不慑服于他的淫威之下。

权势欲和淫虐狂是福马·奥皮士金的第一个特征。他的第二个特征是二重人格。他在主子面前是奴才，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而且得志便猖狂。他在寄人篱下的时候，是一个仰人鼻息的小丑，受尽将军的凌辱。按理，他的同情应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人们一边了，可是不然，正如《红楼梦》中所说：“中山狼，无情兽。全不念当日根由。”关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作了深刻的描述：“卑劣的灵魂，自己刚从压迫下爬出来，就去压迫别人。人家压迫过福马，他也立刻感到有必要自己去压迫他人；人家对他装腔作势，他自己也开始对别人装腔作势。他当过小丑，便立刻感到他也有必要养一批自己

的小丑。他吹牛常常吹到荒谬的地步，他装腔作势常常装到令人作呕，他锦衣玉食，犹不满足，他作威作福，猖狂已极。”

福马的第三个特征是吹牛、伪善和好为人师。要骗人必须有幌子。这幌子就是上帝。他口口声声说，他是上帝派到世上来的，他降临人世的目的就是为了匡救世人，劝善惩恶。他用上帝的名义使善良的人们慑服，他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使天真、幼稚的人们敬仰，他道貌岸然，使人不敢仰视。

福马的成功之道，不在于他的力量，而在于别人的软弱。他的成功之道，必须在他的崇拜者罗斯塔涅夫身上去寻找。

罗斯塔涅夫这人的特点，是过分善良，过分天真，迷信权威，轻信他人，严于责己和一味迁就、退让。

就是这样一个极其善良的人，他为了供养自己的母亲和供将军挥霍，几乎弄得倾家荡产，可是福马却指责他“不孝”和“忤逆”；他为了别人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恨不得把最后一件衬衫都脱下来，奉送给第一个愿意要的人”，可是他却被福马一再指责为“利己主义者”，而且是一个“阴暗的利己主义者”；福马在他家飞扬跋扈，为所欲为，他就一味迁就、退让，但求相安无事。

这样一个人怎会不被野心家、阴谋家利用呢？有意思的是，一名食客和小丑居然成了实际上的主人，而本来是主人的罗斯塔涅夫却成了实际上的仆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心理描写的大师，但是他不懂得阶级分析。他常常混淆阶级对象。他只知道好人与坏人、善与恶。他常常把某个阶级的特征看成各个阶级都具有的普遍人性。在书中，罗斯塔涅夫是善的化身。他实际上代表的是农民和小市民的特点。

农民和小市民，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和从事生产的特点，“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①迷信权威，迷信“铁腕”，把自己经过斗争得来的胜利成果看成是上面赐给他们的雨水和阳光——这就是小农和小市民的特点。

路易·波拿巴利用了法国农民的落后和偏见，当上了法国皇帝，成了拿破仑第三。福马·奥皮士金原是一个破落户的飘零子弟，他也利用罗斯塔涅夫的落后和偏见，当上了斯捷潘奇科沃村的最高主宰，俨然成了一个小范围的拿破仑。^②

但是这个主宰，这个小拿破仑赐给罗斯塔涅夫的并不是雨露和阳光，而是精神上的揶揄、折磨和暴政。一切忍耐都有个限度。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罗斯塔涅夫终于忍无可忍，起来反抗了，把这个伪君子逐出了家门。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曾引用法国大革命时期创刊的《巴黎革命》周报上的一个警句：

“伟人们之所以看起来伟大，
只是因为我们在跪着。
站起来吧！”^③

这话是发人深思的，可以作为一切尚生活在愚昧中的人

①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97—98页。

② 拿破仑思想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屡屡出现的主题，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中专门论述。

③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104页。

们的座右铭。

但是罗斯塔涅夫的愤激和反抗是短暂的，“充其量不过象点着的稻草的一团火罢了”。他很快就后悔是否做得过了头，是否有损中庸之道？于是又将被驱逐的福马请了回来，奉为上宾。福马这类人的特点就是欺软怕硬。当他看到一向俯首帖耳的罗斯塔涅夫也居然会反抗，就胆怯地采取了另一手，作了一点表面上的让步，成全了他与娜斯金卡的婚姻。于是，一场风波变成了皆大欢喜。收回本来属于自己的东西，——本来是罗斯塔涅夫通过反抗得来的胜利果实，可是他以及福马的形形色色的崇拜者们，却认为这是福马赐给他们的雨露和阳光，福马是他们幸福的缔造者，没有福马就没有一切。于是他们就万劫不复地陷入了更深的奴隶地位。

通过罗斯塔涅夫的反抗和反抗的中途夭折，可以看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时期思想演变的过渡性。一方面，被欺压的人们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还会进行反抗，而不是象他以后作品中的主人公那样听任命运摆布。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说明被欺凌、被侮辱的人们的反抗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他们太善良了，惯于“忍受和宽恕”一切。熊熊燃烧的稻草很快就熄灭了，世界陷入了更深的黑暗中。

五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影响最大的是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他相信人性本善，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的善恶是由外界环境决定的，诚如马克思转述的：

“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那就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①他相信善必定战胜恶。但是在《斯捷潘奇科沃村》中，他虽然仍旧坚持人性本善。但是他又看到，有些坏人天生卑劣，无法改变。

小说中理想的好人是罗斯塔涅夫上校。他相信人，相信人性本善。他说：“当然，我不是哲学家，但是我认为，任何人身上的善都比从外表看来要多得多。”

小说中的“我”无疑代表作家四十年代的观点。书中写道：“于是我热烈地谈起，在一个最堕落的人身上……也可能保留着最高尚的人的感情；人心的深度是无法测量的；我说，不应当鄙视那些堕落的人，而是相反，应当寻求人性和使人性复归；我又说，关于善恶、道德以及其他等等的公认的标准是不正确的，——总之，我慷慨激昂地谈了一通，甚至还谈到了自然派，……”

“叔叔听了以后高兴得什么似的。

“‘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他深受感动地说道，‘你完全了解我，我要说的话你都说了，而且比我说得更好。是这样，是这样！主啊！一个人为什么要恨呢？当做一个善良的人是这么好、这么美不胜收的时候，我为什么常常要恨呢？’”

罗斯塔涅夫也象四十年代的俄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人性的好坏是环境造成的。他把福马的一切并不高尚的乖戾行为，都归之于“他过去所受的痛苦、所遭到的屈辱……”，一句话，归之于他过去的遭遇，他“完全看不出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神圣家族》，第167页。

新朋友不过是一个好色的、反复无常的畜生，一个利己主义者、懒汉和二流子。”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痛心的是好人不善于识别坏人。

谢辽查也替他的叔叔焦躁。他恨铁不成钢，恨他的叔叔“为什么不用鞭子把福马赶出去”。他说道：“我简直无法理解，一面是如此放肆，如此无耻地专横，而另一面是如此心甘情愿地俯首听命，如此容易上当地老实。”他极力劝说和鼓动自己的叔叔“挺身而出，力排众议”，“如果福马胆敢说一个不字，就立刻把他从家里赶出去，给他点厉害瞧瞧”。试想，这样的态度与他稍后在《被欺凌与被侮辱的》中所描写的含垢忍辱、逆来顺受、绝对自我牺牲相比，岂不是异常鲜明的对照吗。

在《斯捷潘奇科沃村》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福马的话来影射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大家知道，果戈理晚年在《与友人书简选》中公开以人民的精神导师自居，为专制政体辩护，主张不要废除农奴制，鼓吹“正教、专制、国粹”三原则。为此，别林斯基写了《给果戈理的一封信》，严厉批判了果戈理的这本“有毒素的书”。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正是因为当众朗读了别林斯基的这封信而被捕入狱的。现在，事隔十年，当作家即将被“恩准”从流放地释放回彼得堡的时候，他居然毫无顾忌地影射和讽刺

① 人性问题曾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俄国民众知识界讨论的中心问题。到五十年代末，社会思潮已从一般的清谈转到政治方面，即起而反对专制和反对农奴制。现在，事隔十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把这个过了时的问题重新提出来。这说明他的思想大大落后于他的时代。这也是《斯捷潘奇科沃村》所以“失败”的原因之一。

果戈理，——这不能不说明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经过十年的牢狱之苦，仍然忠于自己的反专制反农奴制的信念，并无悔改之意。

诚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流放地塞米巴拉金斯克曾经说过：“政治变革在俄国暂时是不可思议的，也为时过早。”^①其所以暂时是不可思议的，乃是因为人民的落后和觉悟不高，因此在目前的条件下还谈不到革命，革命还为时过早。这与他以后的否定革命，鼓吹“忍受和宽恕”一切的基督教精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上面已经提到，作家在《斯捷潘奇科沃村》中描述了弱者的反抗必定是短命的，充其量也只能赢得强者的若干让步，不可能根本改变现状。但这毕竟不是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普希金纪念碑的揭幕式上所呼吁的：“忍耐吧，骄傲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十分正直、十分善良的人。他有一颗博大的心。他后来走上歧路，并不是他个人的品质问题，也不是敌人的断头台、苦役和流放把他吓住了，更不是他得了精神病。他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一位伟大的天才在沙皇俄国的深刻的悲剧。

臧 仲 伦

1981年3月

① 弗朗盖利：《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第35页。